一

少年时代

海城唐王山后村

1905 年 1 月（清光绪三十年冬），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海城地处松辽平原东部边缘，辽河下游左岸，辽东半岛北端。东有千山，西有浑河、太子河、辽河，东高西低，并由高向低形成山区、丘陵、平原、洼地的格局，自然条件很好，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南距营口 45 公里，北距鞍山 30 公里，离沈阳 120 公里。古有“辽左重地”、“渤海奥区”之称，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以“辽南粮仓”闻名。

山后村在海城南 4 公里的地方，唐王山北山脚下。唐王山是座小山，在南满铁路（今长大线）东侧，八里河南岸，东西长两公里，南北宽 1 公里，海

拔130多米。这里有很多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与薛仁贵在这山顶上下过棋；唐太宗脱下靴子抖落出来的土，形成了山顶上的这块平地，后人称为“脱靴顶”。唐王山因此而得名。

我出生时正值日俄战争。这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后经美国斡旋，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这是一个牺牲中国和朝鲜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在条约中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并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从此，日本更加紧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母亲生我的时候，战事频繁，兵荒马乱。为了免遭不测，她有时不得不把我藏到柴草垛里。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归日本占有。我在少年时代，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欺压和残害。南满铁路就从山后村西经过，我们家的菜地紧挨着铁路。乡亲们到村西种地，经过铁道时常常遭日本人的蛮横打骂。

我 的 家 庭

相传我的祖辈是河北省清河县人，在明朝洪武年

间，老哥俩靠卖豆腐维持生活。一天为支架倒塌的锅灶用了几块城墙上的砖，被官府得知，结果被发配东北，就在海城唐王山后落了户。我的祖父是很贫苦的，给人家当长工。后来，靠修铁路挣了几个钱。晚年过继给叔叔，算是有了几亩薄田，成了自耕农。我的父亲吕名禹，兄弟 4 人，大排行老五。从年轻时就给人家赶大车，因为光靠种地难以维持生活。当车伙计，受雇于车主，冬闲时跑营口拉脚。后来赚了一点钱，就与同族兄弟合伙。入冬时买个大牲口，往返海城、营口拉货运客。开春种地的时候，就把骡马卖了，赚点脚钱，买个毛驴种庄稼。

我们兄弟姐妹 7 人，大姐比我大两岁， 3 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是东山丁家沟人，家境贫困，为人精细善良，手很巧，吃苦耐劳，相貌俊秀，活到了 90 多岁，人缘极好，很受乡里尊重。父亲搭伙计赶大车，好合伙喝几盅老酒，身材高大，不识字，性情豪迈粗鲁。母亲虽然也不识字，但思想开通，性格随和，解放后有时说笑话：“还是现在世道好，男女婚姻自主，要是在先也兴‘打八刀’（东北话离婚）的话，俺们全家都得离婚。”

我从小就好打抱不平，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爱顶着来。三大娘为人老实厚道，就是因为连生几个女儿，遭奶奶嫌弃，让三大娘干粗活，养猪喂狗，母亲

干细活，做针线。看三大娘在奶奶面前忍气吞声，我觉得不公平，常和奶奶顶嘴。奶奶偏心，重男轻女，时常偷着给我点好吃的，越是这样我越是顶撞她。她气急了打我，我就跑，边跑边喊：“你就是偏心眼……反正你追不上我！”有时我把老人家都气哭了，骂我：“不知好歹，没良心，我白疼你了！”我对奶奶很有反感，认为奶奶待人不公。

山后村当时有 100 多户人家，大部分姓吕，有少数姓吴的。一条东西街，东街富，西街穷，我们家住在西街。孩子们打架，我是西街穷孩子的头。五六岁时就知道恨日本人，我们做游戏打仗，骑着秫秸当马，谁输了谁就装日本人。玩着玩着就真打起来了，有钱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我就领着穷孩子和他们拚命打。

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占地毁庄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洼地长草，很茂盛，村里人放牧牲畜，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有时把牲口打死，或是抢走。我的祖父、大伯过铁路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

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

1913 年，我 8 岁的时候开始读书，就在唐王山后本村上小学。村边有条人行横道不准中国人走，中

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车道。有一次，我看见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当时我都气哭了。还有一次，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又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里了。眼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屠杀，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

人小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并解释说，是言语的言。我听后感到不对心思，边走边想。走到家门口，我便坐在门坎上沉思起来：上学读书为的是求知识，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才能打日本。于是，我打定主意自己改名为“正操”。为了求得祖父同意，就说是老师给起的大名，是操练的操。我没敢提当兵的事，因为那时还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年代，祖父最疼爱我这个长孙，指望我光宗耀祖，怎么能让我当兵！

我上小学时，已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提倡剪发，县里派督学来查。当时同学们都不敢剪，我早就想剪，可是家里不答应。就此我在班上第一个站出来，把小辫剪掉了，回到家奶奶一看，就骂起来。我提着剪下来的辫子，得意地抖落着说：“剪下来有啥不好，上边长满了虱子！”我为了剪辫子，成心不梳不洗，让它生虱子。

山后村小学的华荫南老师，他偏向东街地富子弟，叫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班长，时常欺负西街的穷孩子。我不服气，就和班长打起来了。找老师去评理，他偏袒地主子弟，拉过我去要打手板，我气急了，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劲儿，把板凳条掀下来一根，狠狠揍了老师一下子。我知道惹了祸，撒腿就跑，不敢回家，就躲到河边壕沟里迷了 3 天。村里人河里、井里找遍了，到处找不到，都很着急，怕发生意外。因为我路过家门口时见到母亲，曾悄悄告诉她我藏在哪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母亲不声不响地每天给我送点吃的。村里人找不到我，老师也着慌了，都说只要找回来，可不能再打再罚了。母亲随即送信给我，说老师再不打了。这样，我才敢回家和见老师。老师说，不打了，可是要罚我背书，让我背 3 篇古文：韩愈两篇《祭十二郎文》和《祭鳄鱼文》，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要我温习一下，第二天背。当时我念了两遍后，自信地说：“我现在就背！”于是一口气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华老师很惊奇，立即改变了对我的态度。爷爷没念过书，所以对我念书很重视，每天下学后爷爷都要我背书，他不识字却严厉，我不敢糊弄他，只要一打“奔”儿，他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我念书还没入门，怎么也背不好，常挨打。这次却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

下就开了窍。以后华老师对我特别好，给我补课吃偏饭。

我在小学念了不到 4 年书，家里就供不起了。买一支铅笔要哭几次，才进城给买，有时靠大姐、母亲的体己钱买支铅笔。1916 年冬我就辍学了。1917 年初开学时，华老师认为我辍学可惜，他要我附课学习，由他为我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准备一年后，再由他送我免费入县立中学。华老师还颇费心思地对我说：“再给你起个号吧，就叫必之，古书云操之必正。”殷切地希望我长大成才。华老师的这番苦心，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对这位良师感念不尽。

我自己也想继续读书，即重新入学附课，农闲补课，农忙干活。附学的半年，家里买不起书，要是上中学更交不起饭费、书费，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辍学了，在家跟大人下地干农活。

三年学徒生涯

1918 年春，我由华荫南老师介绍，到他家在海城北关开的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去学徒。学徒很苦，起早贪黑，干重活、杂活，时间长了，过于劳累得了肺病，吐过血。

在缫丝厂期间，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一进北关，有个卖吗啡、“白面”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挡

着路不让走，踢了我一脚。于是我揍了他一顿。这个孩子跑回去后，日本人就告起状来，告到缫丝厂，告到县政府。丝厂经理和县长都吓坏了，我站出来说：“是他先打的我，我的腿还被踢红了一块呢。”丝厂经理和县长听我说的在理，就向日本人解释说不怨我，这孩子干活挺老实，不惹急了他不会无故打人的。好说歹说，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学徒时，我挤时间念书，抓着什么看什么，（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还坚持练字、打算盘，文化有了提高。在农村讲究“说书”，谁讲我都去听。

在缫丝厂学徒将近 3 年，到 1920 年冬缫丝厂倒闭，经理是华荫南老师的哥哥，他将我介绍到海城车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到 1921 年春，因粮栈生意不好，我被辞退回家，在家种地。

兄弟姐妹长大起来，父亲以儿女的婚事当交易，做人情，在外面拉脚合伙喝酒时，说近乎了就给儿女订亲。他说一不二，母亲根本说不上话。我的几个姐妹长得都很俊气、灵巧，却都很不幸。大姐很能干，待我极好，她羡慕男孩子，对我说还是你们在外边好，走南闯北，女的活一辈子死时落块棺材板。二妹

既漂亮又聪明，我参加直奉战争负伤，她用体己钱买东西到医院看过我，临走还留了几块钱给我。父亲给她找了个很不如意的丈夫，一直忧伤哀怨，终于得了肺痨病，死得很早。我对大姐、二妹的感情深，对她们的悲凄的命运，极为同情。

母亲温和仁慈，为儿女操劳一生。三弟贪玩，不好好念书，我打过他一次。母亲伤心地说：“我再苦再累，可也没打过你们谁一巴掌。”

我在少年时代，就是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经常想到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打日本。

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 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二

在张学良身边

初入东北军

1922 年春，有一位素不相识的远亲，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这位远亲介绍说，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重用识字的青年人。我从小就想当兵，以为扛上枪，就能打日本。经说服家里，我就入伍了，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

卫队旅确实是当时的一支新军，服装整齐，器械精良，入伍者皆为精壮的青年，很有一股蓬勃朝气。副官长高尚志、参谋王琢如，全是留日士官生。谭海那时已作随从副官，刘鸣久作书记官。后来处于东北军新派领导地位的二六旅，就是由卫队旅演变而成，而张学良以及郭松龄也就成为东北军新派领袖人物。

卫队旅旅部原在沈阳小南门里，后迁入北大营。

我入伍后是在哈尔滨驻防。约两三个月，因当时军队绝大多数是文盲，而我能读能写，营部书记长周白毛（外号）要我去给他当贴写，就是以一个士兵的名额到营部给书记长和军需长等抄写文件。下半年卫队旅旅部在部队招考文书上士，我考取了。于是我就到旅部副官处当上士。当时旅部还在沈阳城内，副官处长已是高纪毅。

考取讲武堂

在卫队旅旅行当上 士期间，张学 良 看我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我圪东北讲武堂。我于 1923 年冬考取讲武堂，为第五期

上讲武堂后我学习兵器、 地形等教程很吃力，因为我只念过 3 年多少学到 现在 却要学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但我想办法努力补课，终于赶上了。同时，我还到青年会学习英语。

1924 年秋，讲武堂停课，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我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战斗中我负了伤，经郭松龄夫人亲自关照，得以及时送进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医疗设备条件都很好。住院期间，郭松龄夫人曾到医

院看望。郭夫人韩淑秀，奉天女子师范毕业，教过书，思想进步，热心妇女运动，办军民同乐会，慰劳伤兵，有办事能力，和郭松龄可以说是患难夫妻。

两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是最为辛劳的有功之臣，江苏督办一职原已允诺委任郭松龄，但一经发表却是杨宇霆。而当杨宇霆被孙传芳打回沈阳，请求张作霖出兵，再下江南，主力又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部的一、三联军。郭松龄深感旧军队的腐败无能，决心在此时倒戈。张学良耐于和张作霖的父子之情，未和郭松龄共同起事。郭松龄倒戈受挫，和夫人韩淑秀换装成乡农打扮，躲在农家白菜窖内，被王永清拿获，就地枪毙。尸体运回沈阳，在万泉河体育场，陈尸 3 天。当我看到时掉了眼泪，就不想在东北军干了。郭松龄的死，实为张学良建设东北新军的一大损失，失去一个臂膀，在改编郭松龄残部时，悲不自胜。后来曾说要给郭氏夫妇建墓树碑，以作纪念。

郭松龄倒戈时，高纪毅任郭部第十九旅旅长，勇敢善战，节节进展，占领了新民屯。当时张学良住在兴隆店，高纪毅打军用电话给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能倒戈，否则明天准作俘虏。又奉劝张学良，不然还是及早逃走。倒戈挫败后，高纪毅到天津躲起来。张学良打听到他的行踪后，写信叫他回沈阳，保证无事。高纪毅回到沈阳，由副官处长升任北宁铁路局

长。以后又作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掌管东北交通大权。

我参加直奉战争后，1925 年春讲武堂复课即回校继续学习。同年 10 月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受到挫败。我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以希望。对于郭氏夫妇同遭惨死，很伤心，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分配我任新兵营长，我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12 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我到锦州，分配担任他的少校副官，主要是帮助张学良管理讲武堂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

从此，我即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

从 1922 年我入东北军，1925 年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1929 年去十六旅到 1936 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在我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不断向前发展。

张学良生于 1901 年，和我是同乡，海城桑子林詹家窝铺，现属台安县。六七岁开始就学，启蒙老师是台安县举人崔骏声和海城老儒杨雨辰。在沈阳，授读的是辽阳白永贞，清末拔贡，时为奉天省议会议

长、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给张学良奠定了旧文学的基础。张学良读书聪明，善于颖悟。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

张学良在读书时，首先接触的是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人普赖德是总干事，他的中国话说得极为流利。张学良每天向普赖德学习两个小时的英文，并作了青年会的董事，成为中坚分子。阎宝航就是在这时作青年会练习干事，并与张学良成为朋友的。

阎宝航也是海城人，1895 年生。他作青年会干事时，组织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举办游艺会、旅游会、电影会等活动，办得极有声色。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程敬一，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后来沈阳讲演。张学良次次参加，专心静听，并在府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欧阳予倩到沈阳时，还在青年会召集话剧爱好者上演过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些活动，使沈阳风气大开。

我入东北军后，以及在讲武堂期间和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时，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坚持学英语，受益匪浅。

1923 年春，青年会干事郭纲到广东开会后回到沈阳，带来一批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讨论集》、《阶级斗争》、《列宁传》等等。翌年

春，党派韩乐然从上海到沈阳工作，又寄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1925 年春，中共北方局派任国桢到沈阳建党，并在阎宝航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运动史。青年会曾派阎宝航赴西欧留学，归国后任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在阎宝航的影响下，青年会成为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文化教育的阵地。

我和张学良所处地位虽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的掠夺和蹂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

我在锦州时间不长，1926 年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即迁至北京，进驻光明殿。

1927 年上半年，军团部进到郑州，先和直系吴佩孚退回来的军队作战，以后又和张发奎军队作战。下半年，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作战。这时我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传队长。不久，宣传队长由黄显声接替。冬季，军团部退回北京。

1928 年初，张学良派我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干事。同泽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是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娱乐的地方，我在这里任职一年多。后移防到双城堡，任中校秘书。

就在这期间，我开始受到党的影响。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加人

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当时我还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记得有一本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著的书，名叫《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也看过托洛茨基自传，还看了列宁的（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书。当时还看不大懂，我的思想里只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从日本回来的那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对我有不少帮助。他们还导谕我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对我启发很大，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张学良批评我年轻浮躁，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

热 河 抗 战

1929年春，我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旅部驻在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旅长缪澂流，副旅长杜国恩，参谋长邢培模，副官长朱逢源。

1930年冬，十六旅入关，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年，1931年夏移驻北平南苑。这时，参谋长改由邓玉琢担任，我仍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

涨。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他的嫡系军队发百分之百，对我们先是二八，尔后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江桥一战，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东北军有很大震动。因此，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十六旅是在 1932 年冬，奉命开赴热河，在喇嘛洞子一带布防，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在这里防守期间，和日军时有接触。

1933 年 2 月初，因防守左翼万福麟的二十九旅被日军突破，部队退到都山县。 2 月底，又退到长城义院口一带防守。十六旅旅部驻在抬头营。防守部队在喇嘛洞子迎头痛击敢于西犯的日军，敌人死伤惨重。我部缴获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敌部队的各种旗帜、战刀、机枪、通信器材，以及日军的护身符“武运长久”、“护心佛”等。我军伤亡不大，受到张学良嘉奖。

十六旅奉命撤退到青山口。六四七团团长田朝凤担任后卫，却先率部仓惶撤退，造成混乱。田朝凤被撤职，追究责任，营长赵雷畏罪带队投敌。逃过去不